

王 刻

聊斋志异校注

◎ 清·蒲松龄／著
◎ 孟繁海 孟原／校注

◎ 齐鲁书社



刻 王

聊斋志异校注

◎ 清·蒲松龄 著

◎ 孟繁海 孟原 校注

齐鲁书社

王刻聊斋志异校注

清·蒲松龄著

孟繁海 孟原校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 印张 2 插页 72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3-0674-0
I·218 定价：54.00 元

前 言

在中国小说史上，清代出现过两个顶峰：一是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一是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累代书香”，祖上虽不怎么显赫，在当地却是一门望族。只是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中逐渐衰落。其父蒲槃，字敏吾，本是读书人，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弃学经商；略有积蓄后，不复经商，以其渊博的学识，在家教儿辈读书。蒲松龄幼年从学于父亲，一生刻苦好学，在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是著名诗人施闰章，对他十分赏识，说他“运笔成风”，一时文名大振。此后他一方面与同乡学友李希梅、张笃庆等结成“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蒯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一方面靠“舌耕”过着清寒的教学生涯。

由于科举蹉跎，迫于生活，在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间，他应同乡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的邀请，先后在宝应和高邮做幕宾。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远游。这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他协助孙蕙赈济饥民，历经艰辛，使他对官场的腐

败与人民的痛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家乡后，他长期在同乡西铺毕际有家设馆。他利用毕家丰富的藏书，好学不倦，笔耕不辍。他从十九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高龄，才援例补了个贡生。他七十四岁丧偶，过着“对酒无欢只欲愁”（蒲松龄《除夕》）的悲凉生活，两年之后依窗危坐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

蒲松龄一生著作甚丰，有通俗俚曲 14 种，计有《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快曲》、《丑俊巴》、《攘儿咒》、《增补幸云曲》等；还编著有《帝京景物略选》、《省身语录》、《怀刑录》、《农桑经》、《小学节要》及《宋七律诗选》等书，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流播海内外，并译为多种文字，蜚声国际的《聊斋志异》。这部“孤愤”之书，不仅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个顶峰，还使作者在国际上博得“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蒲松龄的青年时代。康熙十八年（1679），他作《聊斋自志》：“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这部传世之作，经过长期积累，几经修改增补，这时已初具规模。成书当在暮年。他的儿子蒲箬等的祭文都说：“暮年著《聊斋志异》”，指他在晚年最后修订了稿本。这部巨著“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的独专”（柳宗元《唐故工部员

外郎杜君墓志铭》)，是他穷其毕生心血的伟大作品。

《聊斋志异》的创作与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青壮年时代，作者“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加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唐梦赉《序言》）这样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写作，不断传抄流布。从故事情节看，写作时间最晚的是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和《化男》，作者这时六十七岁。假定留传到现在的半部手稿本是经过最后修订的稿本，那末，最后修订工作当在作者六十七岁之后；而从它与几种抄本校读情况看，手稿本中也有一些讹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即使我们看到的半部手稿本是最后修订本，也并不排除它存有讹误的可能性；一是可能我们看到的这半部手稿本根本不是最后修订本。不管怎样，手稿本的发现并不能替代和否定其他抄本的校勘价值。

二

十多年前，为论证《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的出版价值，我在几种抄本、刻本校读过程中，在张良权学兄的帮助下，把二十四卷抄本与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的部分篇章进行了对校，感到王刻十八卷本虽为删订本，但从版本源流看，除删节文字外，还是有所本的。指出王刻十八卷本有诸本都没有的《某经略》的故事，而在二十四卷抄本里有。所以我在匆忙草成的《谈二十四抄本〈聊斋志异〉》一文中，有段王刻十八卷本与二十四卷抄本相关联的文字（见朱一玄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上，346页）。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属于猜测性的

陈述，因为没有从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的思辨。此后有的学友问及王刻十八卷本的其他情况，仍感心中无底。一种可行性的弥补办法，就是把它校点注释排印出版，使它从藏家收藏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大众传播的广阔天地，使人们看到它的完整的本来面目，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另外，我以为王刻十八卷本“删繁就简”，简洁明快而多不失其正，可读性强。王刻十八卷本也是针对过去“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抄写传讹，寝失其旧”（王金范序）这种现象的。至少它与青柯亭刻本一样，作为最早的《聊斋志异》刻本，在结束手抄原始传播方式方面，定然有其历史的功绩。

王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馈赠。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有理由对它抱有兴趣，所以许多同志对它有种企盼的心理。这便推动我奉献一点心力，做这种校点注释的工作。

王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删节痕迹不明显，读来文气一贯，绝大多数内容并无残缺之感，可见删定者王金范还是有一定文化学养的。这个版本从主题到人物故事都不失原著的本色，保持了原著的结构、语言和思想风格。这是王刻十八卷本的基本点。

三

王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内封题为：“乾隆丁亥孟夏新镌，介景堂藏版”。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首页“聊

斋志异目录”的左下方，题为“淄川蒲松龄柳泉著”，并列第二行为“金坛梓园横山删定”。依次为卷次，分类目，篇目。

根据《光绪金坛县志》、《蒲台县志》、《长山县志》上关于王金范的简单记载，经比照辨析，可知王金范是江苏金坛县人，监生，先后在山东蒲台县、长山县做过县丞。他于乾隆二十三年任于蒲台县；后调长山县，时在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离任。他的接任者是毕钟秀。王刻十八卷本自序末落款：“时乾隆丁亥孟夏横山王金范书于周村且居书室。”时值他在长山县离任之时，从他斋名“且居”看，似在他解任之后，并未马上离开周村，而是在周村驻留过一段时间。此书无疑是编定和刻于周村的。陈乃乾根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考知王金范为方苞侧室杨氏生女之婿。方苞乃桐城书香世家，他“以古文为时文，又以时文为古文”（《潜研堂集·与友人书》），在古文方面一时称雄天下，被誉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方苞集》附《方苞年谱》）。在他的生活由困顿而步入小康时，平地起风波，因他为同乡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牵入文字狱大案，被判死刑，关押在刑部大牢里。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忽然康熙帝下了一道朱谕，称赞“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骤然间方苞的生活道路得到意外的转机，因祸得福，被召进南书房。此后十年为康熙帝的文学侍从；又十年为充武殿总裁；后十年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方苞的这一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的经历，实际上是清政府对知识分子一则以高压，一则以怀柔的两手政策交替使用的集中表现。这不仅是方苞的个人遭遇，“避席畏闻文字狱”，这种野蛮残酷的文化专制

主义，使同代和后辈学人普遍感到心理重压。王金范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丞，能在这种氛围中，用很大的气力整理刻印《聊斋志异》，说明他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学养，同时也说明他相当的勇敢。

王金范在序文里讲述了有关十八卷刻本的一些情况。主要指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的春天，他在蒲台任县丞的最后一年，到济南公干，从王约轩处借到曾氏家藏抄本《聊斋志异》。这便是王刻十八卷本的底本。王约轩，名升，在王刻十八卷本中有他的题词，署“翼城王升约轩”。他是山西翼城西郑村人。优贡。乾隆三年选授武寨县训导，升山东淄川县丞，迁利津县丞，工书法、诗词、古文，为人和平谨厚，与弟猷成、廷华刻有《埤篋集》。乾隆二十年任淄川县丞。在《淄川县志·艺文志》里，记有他同淄川学官、名士之《游黉山联句》。序曰：

乾隆辛巳仲春十有七日，偕孟圣文（衍奎）、章玉书（锦麟），以祭汉尚书董公、宋孝子王公至此。时同游者：王柳村（廷楠）、孙麓村（文盛）、高岸青（绪）、张亮斋（廷家）也。晋翼城约轩王升记。

其中高绪是高珩的曾孙，张廷家是作蒲松龄墓表的张元之孙。他们的祖辈均与蒲氏厚交，他们有条件看到和借到《聊斋志异》稿本或抄本。

王序中所讲的“曾氏家藏抄本”中的曾氏，在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曾南村条曰：

曾南村，尚增，历城人。吾邑张榆村（张元）先生高第弟子也。（《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1994版，卷二，

91 页)

据袁世硕先生考证：雍正元年，张元（榆村）在济南朱家坐馆，曾为朱氏弟子从淄川蒲家借来《聊斋志异》原稿。曾尚增（字谦益，号南村）曾受业于张元。他很可能直接据蒲松龄手稿或朱氏抄本，过录过一部《聊斋志异》（《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 版，375 页）。王序中所讲的王约轩所借到的《聊斋志异》抄本，即曾尚增的家藏抄本。

四

《聊斋志异》手稿本，现仅存半部；总篇数多少，不得而知。张友鹤汇校的三会本共收 491 篇。铸雪斋抄本分 12 卷，共收文 488 篇，其中有目无文的 14 目，实有 474 篇。二十四卷抄本，共收文 474 篇。与王刻十八卷本同时刊行的青柯亭本，共收文 431 篇。王刻十八卷本共收文 265 题，281 篇。宋允睿《跋文》说：“吾友王子横山先生，嗜古好奇，学优遇啬，殆与柳泉后先同辙。爰取是书删而订之，得十八卷，名曰‘摘抄’。”王序也说：“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余，乃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分门别类，手抄而点窜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这都明确指出王刻十八卷本的选本性质。

王金范还是很自负的，他对抄本情况有个夸大其词的评估。王序说：“第其书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抄写传讹，寢失其旧。或前后舛凿，而神理不相贯注；或头绪繁剧，而宾主不甚分明。犹之名葩杂于芜草，嘉植蔓于

藤萝，实可惜也。”我们今天看到的几种抄本，可能是经过认真整理而后抄定的。王金范当时所依据的曾氏抄本，也许原始一点，但也未见得问题如此之严重。这段话，显然是为他的“删定”做铺垫，而不是对《聊斋志异》本身和抄本的真正褒贬。

作为一个选本，自然有其局限，难能涵盖全貌。漏选少数佳篇（如《席方平》、《促织》、《梦狼》等），也不难理解。多数漏选的作品，是抨击“官虎而吏狼”的，很辛辣尖刻，很有刺激性。作为小小县丞的王金范，处在大兴文字狱的大气候下，而自己的近亲又遭文字之祸险些丧命，有识无胆，心有余悸，这是很自然的。总的看来，漏收的名篇佳作，比数不大。

王金范仿照《太平广记》“采摭菁英，裁成类例”的做法，把编选的内容，分为“孝、悌、智、贞、义”等25类。这种“分门别类”的做法，在清代不乏其例，我以为这无大害亦无大益，诚如俞曲园所说：“无甚深意，殊觉无谓。”（《在春堂随笔》卷六）而综观其分类及其内容结构，列在前面的标以封建意味甚浓的类目，如“孝、悌……”者，精佳之作不多；倒是列在后面的类目，如“仙、鬼、狐、妖……”者，精佳之作连篇。就其类目看，封建性强的在前；就其内容看，有分量的批判性、思想性较强的居后。这自然可以看作是王金范封建意识的流露，但也有意无意地起到隐蔽锋芒的作用。

王刻十八卷本“删繁就简”的“点窜”功夫，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绝大多数的词语改动无可非议，如前面所说，还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而无损于文章的意蕴和风格；但也有的是无谓的改动；甚至有的可以说是败笔，是不可取的。

首先，是改换题目（在本书篇目后边括号里列有手稿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与之相对应的篇目，书内也有注文一望而知）。这不仅是繁简的问题，有的改动可以看出王金范在理解上的侧重点。如《胭脂》之改为《施愚山》，侧重点在表彰施愚山的深思明察，折狱之清，用心之苦。再如《贾奉雉》之改为《郎生》，是因为对人物理解的侧重点不同而改换。更多的情况我看也属“无甚深意，殊觉无谓”的。

其次，在原文的删改方面。有的无可指摘；有的保存了主干，删改了枝节，使人感到不及原作丰满，但文字过渡的自然流畅。极个别的地方，由于个别词语的改动，而出现纰漏和笑话。

《聊斋志异》中，虚构的表象蕴藏着作者的情思与愿望。作者用最不理性的形式作最理性的文章。他的主流意识是历史的、批判的。作者以虚为文，以文为史，以史为实，史即现实。所以“异史氏曰”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成分，它画龙点睛，深化意旨，是文章整体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王金范对它的某些删节，显得很不够慎重。这也是王刻十八卷本的一个缺点。

五

列宁说：“最可靠、最必须、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全集》，卷二，430页，人民出版社）既然王刻十八卷本之前，有手稿本和抄本在社会上流传，而它的底本曾氏抄本又与手稿本具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那末，王

刻十八卷本虽有删节，但也无妨进行互校，以勘正某些讹误，补正个别错漏，指明一些异同，使我们注释的文本，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本书的校勘内容，不出现“校后记”，而以注文的方式依次出现。这样，作为一种读本，于读者较为方便。在校勘方面，以二十四卷抄本为主本，参以手稿本，铸雪斋抄本和青柯亭本等。对王刻十八卷本文，除有明显的错误和遗漏外，一般不改。注文说明其异同，间或明指何者为正，何者为误。个别的地方王刻十八卷本有残字或漏字，据其他版本予以补正，并加以注明。关系到理解的异文，能读通的不改；不能读通的，注文里指明何本作何字，指明何者为是。王刻十八卷本中的因形似或音似而误的字则据他本予以改正并加以注明。

校勘是种很复杂很琐碎很细微的工作。本书的校勘的重心着眼于理解与文本。因王刻十八卷本是个节选本，它本身所具有的校勘价值，不能与手稿本和其他抄本相比拟，总的说来，王刻十八卷本与二十四卷抄本、手稿本相同处多，铸雪斋抄本次之。别的本子可以纠正它，它有些地方也可以纠正别的本子，个别的地方还可以纠正手稿本。

对于注释来说，不管是运用传统的训诂学，还是西方的解释学，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克服历史的时间间距，避免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超越语言的障碍，正确把握文本的意蕴。而我们通常采用的传统的注释形式，对实现这一目的，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意义结构不仅是语言结构，艺术也是一种“解释学”。对于古典文学的注释，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面临两个层次的工作：首先是注释，用同义语词或近义语词进行字句疏

通，指明用典和词语的依据与意义，进行必要的辨析和判断，即所谓的排疑解难。对难懂的地方加以解释，以帮助读者弄通原意。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极不容易的。不能不借鉴前贤与当代专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谨表深深的谢意。再，便是研究工作。要超越时空局限而把它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来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寻求更为深层的内在意义。这便有待于专家学者的研究专著了。

综上所述，本书校注时所依据的底本是浙江省图书馆馆藏介景堂版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它与青柯亭刻本几乎同时出现，是《聊斋志异》最早的刻本。

王刻本是选本，按分门别类的体例编排。某些篇目与内文有所改变与删节，这是王刻本的特点。书中的篇目、聊斋自志、王序、高序、唐序及书后题词的内容与次序皆依照底本原貌不变。

王刻本篇末保留的“异史氏曰”文字，皆未标“异史氏曰”字样，而以低四格形式列出，本书一仍其旧。为便于读者比照研究，在篇目下的（ ）里，列有二十四卷抄本、手稿本、铸雪斋本与之相应的篇目，并在该篇的注文里，加以具体说明。

本书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承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之资助，并得到出版社及诸师友的帮助与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孟繁海

1993.6.30

序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十八年岁次己未桂月上浣，古般阳聊斋蒲松龄记

良常王乔书

王 序

圣贤之道，中庸而已。子臣弟友之事，日用常行之理，布帛菽粟之文，无所谓异也。所谓异者，必其耳目所未经，考询所不及，是所谓无稽之言弗听者，而何可以传诸海内为哉？然天下固有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则不妨与圣贤中庸之道并行而不悖。今夫庸夫俗子，与之言圣贤切近之理，漠然无所动于中；及闻稗官野史之忠臣烈士、义夫节妇，遂不觉慷慨激昂，悲歌泣下，一若情不能自己者。即一二英敏之儒，搜奇立异，厌故喜新，视《六经》纷纶，为古人糟粕；及与之历诸幻妄，几欲缚船骂鬼，呵壁问天，而泊无所归。乃渐觉伦常之平实可喜，则庄语之不悟而曼言之。非所谓相反而适以相成者欤？非所谓穷诸幻境而反其真者欤？且天下之大，何所不有？文人学士，发一缕之心思，雕刻万类，牢笼众有，诡怪离奇，不可名状；而实则古今之遥，六合之内，原有其人其事，以供才人之发抒。且即无其人，而未始无其事；无其事，而未始无其理。则无一事非寓言，亦无一事非实境也。世之人，域己以自封，直欲使天下事，尽如吾眼见闻。而非是，则震而惊之，毋乃非少所见之故乎？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握化工之笔，为揶揄之论。凡其所言孝第廉节，达天知命，与夫鬼怪神仙，因果报应之说，无不可以警醒顽愚，针砭贤智，即所谓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者，岂得以言之无稽而

置之哉？第其书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抄写传讹，寔失其旧。或前后舛凿，而神理不相贯注；或头绪繁剧，而宾主不甚分明。犹之名葩杂于芜草，嘉植蔓于藤萝，实可惜也。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余，乃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分门别类，手抄而点窜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哦松之暇，聊以自娱。同人忝愚付梓，公诸同好，置之案头，不特可以破拘墟之习见，悟理境之无方，而于世道人心，亦不无少补云。

时乾隆丁亥孟夏，横山王金范书于周村且居书室